

中心语还是指定语？汉语数词的句法位置*

提要 尽管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数词与名词性短语内部其他成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在汉语中，专门针对数词本身句法位置的讨论却相对较少。基于跨方言的材料，本文提出数词既可能是中心语，又可能是位于指定语位置的最大投射。这一区分不仅不是武断的，它实际上还具有相当的语义基础。一方面，位于中心语位置的数词充当存在量化词，能够参与中心语移位；另一方面，作为指定语的数词总是表示具体数值，并可能阻挡一些 DP 内部非论元移位的实现。

关键词 数词；名词性短语；“名数量”短语；“量名”短语；西南官话；吴语

1. 引言

在汉语的数词系统中，“一”和“两”的语义较为特殊。它们不仅能够用于计数，如（1）所示，还可以充当存在量化词（*existential operator*），如（2）所示。后一个功能是“三”及以上的数词所不具备的。

- (1) 我一共买了一/两/三/四/五本书（，不是六本）。
- (2) a. 他没喝一杯酒就醉了。（≈他没喝任何酒就醉了。）
b. 他没喝两杯酒就醉了。（≈他没喝几杯酒就醉了。）

蔡维天（2002）已指出这一现象，并对其外部句法进行了详细探讨。“一”和“两”的计数用法和存在量化用法均需要一定的语境条件才能成立，例如，计数解读无法在（2）这样的否定句中得到：

- (2) c. *他没喝三/四/五杯酒就醉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种解读均可成立的中立语境也不难找到，如（3ab）这样的句子是有歧义的：

- (3) a. 我想买一本书。
b. 我想买两本书。

（3a）的“一本书”既可能表示书的具体数值为一，又可能对（单数的）书进行指称，无论其实现为虚指还是特指^①。“一”表数值时重读，表指称时只能轻读。同理，（3b）的“两本书”既可能表示书的具体数值为二，又可能对（复数的）书进行指称。“两”在后者大致与“几”等同，此时书的数值一定不为一，但并不一定为二。在口语中，（3b'）也是相当自然的表达：

- (3) b'. 我想买两本书，包括《父与子》，《红与黑》，还有《罪与罚》。

“三”及以上的数词一般不表示存在量化，因此该层歧义在（3cd）中难以存在。（3c）强烈倾向于表示具体数值，而（3d）几乎只能表示具体数值。此时数词也基本是重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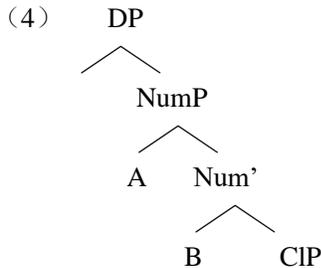
- (3) c. 我想买三本书。
d. 我想买九十三本书。

本文关心的重点是“一”“两”的这种特殊性质是否能够在句法上被区分出来。在 DP 假说（Abney 1987）的框架下，汉语的数词常被分析为位于 NumP，在 CIP 之上，DP 之下（Tang 1990: 413; A. Li

*[题注]待补。

^①文献一般认为（3a）这样的句子有歧义，但主要是指虚指和特指的区分（参见陈平 1987），这层歧义涉及存在量化词的辖域问题，与“一”的具体数值用法无关。这样看，（3a）至少就有三种解读。本文不专门讨论这一层歧义。

1998、1999; Huang 等 2009: 283—328; 邓思颖 2010: 63—84 等), 如 (4) 所示 (略去无关细节)^②:



然而, 数词具体是落在 A 处 (即 SpecNumP) 还是 B 处 (即 Num^o) 则并未得到足够的正面讨论。学者有时对此处理得相当随意, 例如, A. Li (1998) 把数词看作位于 Num^o 的中心语, 而 A. Li (1999) 又把数词看作最大投射, 位于 NumP 的指定语位置; 又如 Huang 等 (2009) 在第 296 页和第 312 页的处理也互不一致。这些文献并未给出明确的理由来说明两种选择哪种更合适: 看起来, 两种方案均并不蕴含太多与众不同的句法后果, 因此讨论的空间也有限。

与之相对, 结合上文对“一”“两”特殊性的讨论, 本文将举出方言中的例子来说明, 在汉语中, 数词既可能位于 SpecNumP, 又可能位于 Num^o。这一区分并不是随意的, 它具有相当的语义基础和与之伴随的句法后果。具体而言, 本文的观点如下:

(5) 表示存在量化的数词是中心语, 位于 Num^o; 表示具体数值的数词是最大投射, 位于 SpecNumP。

也就是说, (2ab) 中的“一”“两”作为存在量化词, 是位于 Num^o 的中心语, 而 (3cd) 中的“三”“九十三”作为具体数值, 是位于 SpecNumP 的最大投射。第二章讨论西南官话 DP 内部非论元移位 (A'-movement), 这一句法操作会且只会被指定语位置的数词所阻挡 (block)。第三章讨论北部吴语的定指“量名”和“两量名”结构。一般认为, 定指“量名”结构的定指义是由 Cl^o到 D^o的中心语移位实现的, 而较少被提及 (但分布同样相当广泛) 的定指“两量名”结构则说明 Num^o到 D^o的中心语移位也同样存在, 此时“两”必然是中心语。从这两章的讨论可以看到, “两”的情况在西南官话和北部吴语中都较为清楚: 它既可能是中心语 (可参与中心语移位), 又可能是最大投射 (从而阻挡非论元移位)。两者在北部吴语还能够通过连读变调区分。然而, “一”的情况却体现出有趣的方言差异^③, 例如, 如果“一”和“两”类似, 总是可以做存在量化词, 从而位于中心语位置, 为什么定指“一量名”短语的分布却远不如“两量名”广泛? 在给出解答后, 第四章继续单独讨论“一”。我们将看到, 尽管在普通话中“一”具有双重身份 (参见 (1—3) 的例子), 但在西南官话中, 它只能是中心语, 表存在量化, 而在北部吴语中, 它只能是最大投射, 表具体数值。第五章是余论和全文的总结。

^② 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 DP 假说在汉语中的适用性 (Bošković 2008、2009; Cheng 2011 等)。例如, 有的研究认为数词和量词先合并为 CIP, 之后再嫁接在 NP 上, 构成一个左分支结构 (Huang 1982; 贺川生 2016); 还有研究认为数词和量词构成一个复合中心语 (Tang 1990: 403)。尽管我们同意 DP 的投射并非理所当然, 但本文暂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后文将显示, 以 (4) 为出发点的讨论无论在描写还是在理论上都是行之有效的。

^③ 可能在所有人类语言中, 数词“一”都具有某些特殊性质。另参见 Kayne (2019)。

2. 西南官话的定指“名(数)量”短语

本节所讨论的西南官话主要是重庆境内的石柱方言，第四节还会涉及其他方言点。石柱方言（及一些周边方言，参见徐海英（2011）的说明）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类似，其名词短语的基本语序是数>量>名，但较为特殊的是，它还使用名>数>量语序来专职表示定指：

- (6) a. 我搞落哒一本书。 “我弄丢了一本书”
b. 书一本落哒。 “那本书丢了”

陈秋实（2022）详细分析了这一语序的移位动因，我们简单概括于此，并进一步讨论。Simpson（2005）提到，在泰语、缅甸语等东南亚语言中，名>数>量是名词性短语的基本语序，而这一语序应被分析为NP移位的结果。如（7）所示，作为CIP补足语的NP提升至D°左侧的SpecDP位置：

- (7) [DP [NP_i]_{[NumP [CIP Cl NP_i]]]}

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方式分析，但因为名>数>量并非石柱方言的基本语序，所以其移位的语义动因必须加以明确。为此，两个关于定指“名数量”短语的重要性质需要被提及。这两个性质是紧密相关的。

其一，“名数量”短语只有在处于对举语境下时才能够自由用于回指。如（8）所示：

- (8) a. 我有一条狗跟一个猫，狗一条很听话，猫一个就不得行哒。
b. #我有一条狗，狗一条很听话。

“名数量”短语受形容词修饰成分时也必须处于对举语境：

- (9) 红的书一本我买哒，蓝的书一本没买。

如果上下文或语境中并不存在比较对象，那么单说“红的书一本”就难以接受。基于DP分裂假说（另参见Lin（2009）对普通话DP的处理），陈秋实（2022）认为此时的NP实际上是提升至DP左缘的焦点位置（即SpecFocP）。更详细的论证请参见该文，对于本文重要的是，这样处理能够得到很好地解释（8—9）的合法性。

其二，并非所有数词都能使用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实际上，仅有“一”“两”“几”能够自由出现（例外见后文），且在该结构中它们无法重读：

- (10) a. 书几本
b. 书一/两/??三/*四/*五本

“书一本”相当于普通话说“那一本书”^④，可尽管“那四本书”“那五本书”都是完全合法的表达，“书四本”“书五本”在石柱方言却不被接受。不同的母语者对“三”的接受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同意其合法度相比“一”“两”大为降低；“四”及以上的数词基本不能被接受。

相当重要的是，尽管“书两本”是相当自然的表达，但此时的“两”只能取得概数解读，而不是具体的数值“二”。也就是说，“书两本”相当于普通话的“那几本书”，而不是“那两本书”。“书两本”与“书几本”在语义上几乎是等价的。注意到在普通话的（2b）中，表存在量化的“两”也是取得概数解读，和“几”等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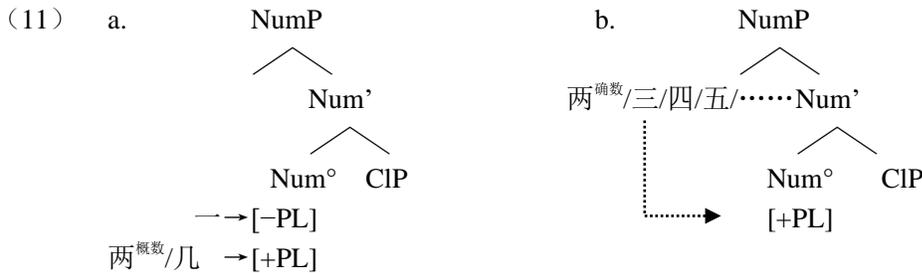
^④ 石柱方言同样使用类似的“指量名”短语来表示定指，其与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区别见陈秋实（2021）。

由此，可以出现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的数词就可分为两组，一组是“一”，为单数的存在量化，另一组是“两^{概数}”“几”，为复数的存在量化。表具体数值的数词总是无法出现在该结构。表单数的“一”和表具体数值的“一”尽管在真值上没有差别，但不能混为一谈。注意到在西南官话中，“一”是唯一的无法重读的数词。在需要强调数量是确切的“一”时，西南官话使用重读量词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此时“一^{轻读}”的出现与否是任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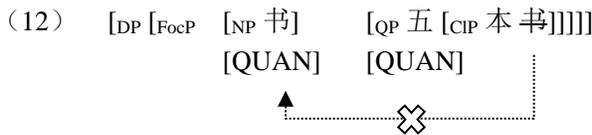
- (11) 问：你买哒好多_{多少}本书？
 答：我买哒（一^{轻读}）本^{重读}。 “我买了一本”

第四章专门讨论“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石柱方言中，只有处于 SpecNumP 位置的数词才承担具体数值的意义解读，而 Num° 中心语仅承载[±PL]特征，是纯粹的功能成分。“一”“两^{概数}”“几”直接合并 Num°，前者表示单数[-PL]，后两者表示复数[+PL]；而当表示具体数值的数词出现于 SpecNumP 时，位于 Num° 的空[+PL]特征便通过指定语-中心语一致 (Spec-head agreement) 的方式获得核查 (check)：



“一”与“两^{概数}/几”是单数/复数的对立，即是单数型和复数型的存在量化；“两^{确数}/三/四/五”则都表达具体数值 (cardinality)。只有后者才能被称作基数词 (cardinal)。前文提到定指“名数量”短语来源于 NP 向 DP 左缘 SpecFocP 位置的移位。一方面，焦点具有量化特征 (Rizzi 1997)；另一方面，表示具体数值的基数词本身也是量化的^⑤。因此，根据 Rizzi (2004) 的改进版相对性近距原则 (Relativized Minimality)，SpecNumP 就是 NP 的潜在管辖者 (governor)，距离 SpecFocP 更近，因此位于 SpecNumP 的具有同类[QUAN]特征的成分就会阻拦后者的提升：



这样处理还可以直接解释一些看起来违反大数词限制的例子。例如，一部分母语者尽管通常不接受“三”及以上的数词出现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但他们却接受 (13) 这样的句子：

- (13) 我买哒一部小车，轮胎四个是米其林的。

此处“轮胎四个”用于关联回指 (associative-anaphoric)，因此“四”并不承担数量焦点。既然“一部汽车有四个轮胎”对于言谈双方来说属于常识性的知识，那么可以认为“四个”本身也是某种关联

^⑤ 自然，这里说的量化特征[QUAN]与前面说“一”“两^{概数}”“几”表示存在量化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包括疑问、否定、度量、焦点等 (Rizzi 2004)。无论如何，处于中心语位置的后者无法阻挡指定语位置的非论元移位。

回指成分——它是指称性的 (referential), 不具备量化特征, 因此这里的“四”自然就不会阻拦 NP 提升。

本节的讨论基于独立的证据, 印证了 (5) 的正确性。在石柱方言中, 表存在量化的“一”“两^概数”为中心语, 而表具体数值的其他数词 (包括“两^{确数}”和“三”及以上的数词) 为指定语。定指“名数量”短语如何生成, 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法生成, 均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⑥。下一节用北部吴语的材料来继续论证。

3. 北部吴语的定指“量名”“一量名”和“两量名”短语

北部吴语的定指“量名”短语是被广泛描写和讨论的语言现象。一般而言, “量名”短语的定指语义被分析为由 CI° 到 D° 的中心语移位实现, 如 (14) 所示 (参见 Simpson 2005, Wu & Bodomo 2009, X. Li 2013: 259—262 等)^⑦:

(14) [DP 本 [NumP 本 [CIP 本书]]]

^⑥有趣的是, 与汉语没有亲缘或值得一提的接触关系的孟加拉语中, 定指“名数量”短语同样存在 (其基本语序同为数>量>名), 如 (i) 所示, 一般同样认为这是由 NP 提升达成的 (Chacón 2011, Dayal 2012)。至少在表面上与石柱方言尤其相似的是, 较大的数词无法进入孟加拉语“名数量”短语, 如 (ii) 所示:

- (i) a. du to chele b. chele du to
 two Cl boy boy two Cl
 ‘two boys’ ‘the two boys’ (Bhattacharya 1999)
- (ii) a. Ami lal boi du to/ tin te/ char te kinlam.
 I red book 2 Cl/ 3 Cl/ 4 Cl bought
 ‘I bought the 2/3/4 red books.’
 b. Ami lal boi ?panc ta/ *choy ta/ *sat ta/ *at ta kinlam.
 I red book 5 Cl/ 6 Cl/ 7 Cl/ 8 Cl bought
 ‘I bought the ?5/*6/*7/*8 red books.’

由此, Simpson & Syed (2016) 宣称, 在孟加拉语中, 小于“五”的数词出现在 Num° 的位置, 而大于“五”的数词出现在 $SpecNumP$ 位置。因为“名数量”短语的语序是由 NP 提升实现的, 而出现在 $SpecNumP$ 位置的大数词会阻挡这一句法操作, 所以 (iib) 各例不合法。他们同时还指出与小数词搭配的量词在语音形式上并不规则: 通用量词的规则形式是 *ta*, 但“二”与 *to* 搭配, “三”“四”则与 *te* 搭配。因为小数词生成在 Num° 位置, 允许作为 CI° 中心语的量词进行中心语移位与其合并, 所以造成了这种不规则音变。

需要指出该论证基本上是理论先导的。一方面, 当前最简方案的流行看法认为句子层面拥有两个语段 (phase: CP 本身以及 vP 或 $AspP$; 参见 Chomsky (2000) 及 Bošković (2014)), 而名词性短语则似乎仅包含一个语段 (DP 本身)。另一方面, CP/DP 的平行性又是 Chomsky (1970) 及 Abney (1987) 以来长期得到关注的问题, 可是这种平行性似乎并未很好地体现在语段理论中。Simpson & Syed (2016) (又见 Syed & Simpson (2017)) 的论点恰好可以弥补这种看似非平行性: 他们认为 $NumP$ 同样是语段。既然大数词生成于 $SpecNumP$ 位置, 为满足语段不透性条件 (Phase-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Chomsky 2000), 在 $NumP$ 内部就只有 Num° 或出现在 $NumP$ 边缘 (即 $SpecNumP$) 的成分才能够移出。综上所述, DP 与 CP 类似, 也拥有两个语段: 其本身以及内部的 QP, 因此两者仍然具有平行关系。

尽管上述分析和正文的分析在结果上没有区别, 在逻辑上却有循环论证之嫌: 其一, 因为有大数词限制, 且 $NumP$ 是语段, 所以大数词需要在 $SpecNumP$; 其二, 因为大数词在 $SpecNumP$, 且 $NumP$ 是语段, 所以反过来, 大数词限制的存在就得到了解释。量词在语音形式上的证据只能看作是佐证。除此之外, $NumP$ 的语段性质就不再拥有任何证明。因此, 本文不采取这一方案。更为重要的是, 孟加拉语定指“名数量”短语的这一限制看起来是纯结构的, 而从正文可以看出, 石柱方言的类似限制还具备语义上的明显理由: 它实际上与数值的具体大小并无关系。

^⑦ 本文遵循既有研究, 统一把量词处理为中心语。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 既然数词既可能是中心语, 又可能是位于 $SpecNumP$ 位置的最大投射, 那么是否可以假设量词也具有类似的双重身份 (CI° 或 $SpecCIP$)? 这样的类比是合理的。注意到一些汉语方言中的定指“量名”短语对量词的性质有限制 (盛益民 2017), 例如宾阳话只允许个体量词、不定量词及个别集合量词进入定指“量名”短语 (覃东生 2007); 衡东新塘方言的定指“量名”短语只接受单音节量词进入 (许秋莲 2007)。可以猜想这些不能进入定指“量名”短语的量词是最大投射 (相较之下, 它们的信息量或音节数更大), 位于 $SpecCIP$, 因此自然无法进行中心语移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尽管没有显性数词出现，但 NumP 仍然需要投射。因为这些定指“量名”短语在语义上总是被解读为单数，这说明 Num°的[-PL]特征在移位过程中得到核查。

更少被人提到的则是显性数词也并非无法在类似的定指策略中出现。在一些北部吴语的方言点中还存在定指“一量名”短语或定指“两量名”短语。前者见于十九世纪的上海方言及宁波方言。（15）中各例是林素娥（2018）讨论的十九世纪上海话传教士文献中的例句。英语释义均来自于传教士原文，具体出处也参见林素娥（2018），在此不再单独标出：

- (15) a. 一宅房子高来野大！ ‘The house is very high.’
b. 一件马挂做好拉哉。 ‘The jacket is made.’
c. 一个外国人要去。 ‘The foreigner will go.’

林素娥（2018）依次从直指、回指、关联回指、认同指四个角度讨论了这些“一量名”短语的定指属性，每种用法都能在传教士文献中找到不少例子。它们与普通话表示不定指的“一量名”短语的区别是不需要怀疑的，本文不再赘述^⑥。我们认为这里的数词“一”位于 Num°，通过 Num°到 D°的中心语移位获得定指解读。如（16）所示：

- (16) [DP 一 [NumP = [CIP 个 [NP 外国人]]]]

定指“两量名”短语的情况则更为清楚。第二节提到石柱方言的“两”既有确数解读，又有概数解读，并且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两”总是概数解读。这一限制也体现在定指“两量名”短语中：“两”在此处的解读只能是概数。吴语的例子之所以重要且典型，就在于“两^{确数}”与“两^{概数}”还具有不同的语音形式。以富阳方言为例^⑦，“两^{概数}”是高降调[niã⁵³]，而“两^{确数}”是曲折调[niã²¹²]（参见盛益民、李旭平 2018）。如（17）所示，只有“两^{高降调}”能构成定指“两量名”短语（李旭平 2018a）：

- (17) 两^{高降调}/*两^{曲折调}斤橘子你放好勒在何里哪里？
“那几斤橘子你放在哪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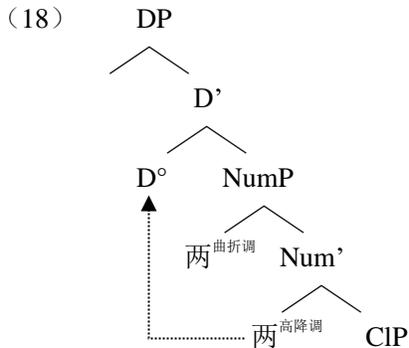
可以认为“两量名”短语的定指语义来自于数词“两^{高降调}”由 Num°向 D°的中心语移位。而表示具体数值的“两^{曲折调}”只能够被分析为与其他基数词一致，位于 SpecNumP 位置，因此自然无法进行中心语移位。如（18）所示：

^⑥ 值得注意的是白鸽（2013）提到普通话中的“一量名”短语有时似乎也能够表示定指：

(i) 我知道是小明干的，但是我不想伤害一个刚入学的新生。

陈秋实（2020）认为此处的“一量名”短语在左缘包含一个 DP 内部的空话题，其定指义由该空话题实现。无论如何，这里的情况与正文所讨论的吴语的情况完全不同，尽管在历时上它们确实可能有所关联。

^⑦ 类似现象在吴语中的分布相当广泛，还见于苏州方言（石汝杰、刘丹青 1985），海门方言（王洪钟 2008），绍兴方言（盛益民 2019）等。本文的论述对它们也同样适用。



两者的区别还可以从它们与指示词“葛”的共现情况中观察到。李旭平（2018b）指出，在富阳方言中，指示词“葛”只能出现在个体指成分的左侧，决不能出现在数量解读以及通指/类脂性成分的左侧：

- (19) a. *葛这小人叫何尔什么名字？
 b. *葛一/三个小人叫何尔名字？
 c. 葛个小人叫何尔名字？

首先，(19b)中“一/三个小人”是数量解读，因此整个结构不合法；其次，富阳方言的光杆名词与普通话不同，只允许类指/通指解读，无法取得个体指解读，(19a)同样不合法；最后，(19c)中的“量名”短语具有个体指解读，因此能够与“葛”共现。从句法角度来说，(19c)中的量词经历了从CIP到D°的移位，而指示词“葛”只能够合并在被其他方式允准的限定语层(D-level)中，它自身不能独立投射出DP。与之相对，数量解读的“数量名”结构为NumP(如(19b))，类指/通指解读的光感名词仅为NP(如(19a))，均不是DP，因此无法直接与“葛”合并。

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两^{曲折调}量名”的表现与其它“数量名”结构的表现一致，而“两^{高降调}量名”序列的表现则与定指“量名”短语一致。如(19d)所示：

- (19) d. 葛两^{高降调}/*两^{曲折调}个小人叫何尔名字？
 “这几个小孩儿叫什么名字？”

可见富阳方言中的这类定指策略均由中心语移位的方式达成。定指“量名”短语与定指“两量名”短语在表层的区别完全是由Num°的[±PL]特征决定的：当Num°具有[+PL]特征时，“两^{高降调}”就合并于此，并进行中心语移位；而当Num°具有[-PL]特征时，它就不具备显性的语音形式，因此由更低的量词中心语来完成移位操作。可以看到两者的关系与句子层面的中心语移位是完全平行的。例如在德语的一般疑问句中，如果I°中心语位置有助动词出现，则由它向C°移位；而如果句子没有显性助动词，则由更低的V°中心语先移位至I°再移位至C°。分别如(20ab)所示：

- (20) a. Hat sie hat jeden Tag die Zeitung gekauft?
 has she has every day the paper bought
 ‘Has she bought the paper every day?’
 b. Kaufte sie kaufte jeden Tag die Zeitung kaufte?
 bought she bought every day the paper bought
 ‘Did she buy the paper every day?’

与前文对石柱方言的分析类似，我们对富阳方言数词的句法位置作出如下总结：

(21) 在富阳方言中,“两^{高降调}”表示概数,出现在 Num^o中心语位置;“一”“两^{曲折调}”“三”及更大的数词均表示具体数值,出现在 SpecNumP 位置。

至此,就有一个很容易注意到的问题需要解释。尽管我们尚未专门讨论它,但是实际上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即为何“一”的情况似乎不太规则?首先,在西南官话石柱方言中,“一”位于中心语位置,不阻挡 NP 提升;其次,在十九世纪的上海/宁波方言中,“一”同样能够出现在中心语位置,因此得以参与中心语移位;最后,在富阳方言中,“一”的表现与其他表示具体数值的数词一致,与典型的中心语成员“两^{高降调}”反而不同,因此只能被分析为位于 SpecNumP。

这一点不难回答。作为 Num^o中心语的“一”用以核查[-PL]特征,而在富阳方言中,这一任务是由量词移位完成,并不需要某一显性形式在 Num^o进行外部合并。换句话说,在功能上,定指“一量名”短语与更为常见的定指“量名”短语是竞争关系。林素娥(2018)已经提出如下猜想,即历时地看,定指“量名”短语由定指“一量名”短语演变而来。用我们的话说,即后者尚需要一个额外的显性形式来核查[-PL]特征,前者则直接通过移位来达成这一点。与之相对,[+PL]是更有标记的取值,因此必须通过某种显性成分来核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定指“两量名”短语比定指“一量名”短语常见得多。也就是说,在富阳方言中,SpecNumP 的数词“一”之于 Num^o的零形式,就如同 SpecNumP 的其他基数词之于 Num^o的“两^{高降调}”。此处的分析还使我们回想起 Greenberg (1963) 的第 35 条共性(中文是陆丙甫、陆致极(1984)在《国外语言学》的译文):

(22) There is no language in which the plural does not have some nonzero allomorphs, whereas there are languages in which the singular is expressed only by zero. The dual and the trial are almost never expressed only by zero. (复数在所有的语言里都用某种非零形式的语素来表示,而单数在有些语言中仅用零形式表示。双数和三数几乎从不采取零形式。)

这同样是在说[+PL]相对于[-PL]是更有标记的。“一”在很多汉语方言中都存在简省现象[®],其他具体数词的简省从逻辑上来说则是无法想象的。无论如何,尽管为何数词“一”具有显然的不规则性这一点本身并不难解释,可是这种不规则性在一个方言/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却常常是复杂的。接下来的一节继续对数词“一”的句法位置进行讨论。

4. 不规则的“一”

前两节分别阐述了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两组论据。尽管它们已足够说明问题,但正如任何基于具体事实而提出的普遍观点一样,(5)这样的宏观论述(在这里重复为(23))还留下了若干更加细节的问题以供探讨。本节继续关注数词“一”的中心语/指定语双重身份。已经看到它的情况并不是那么规则:“一”常常伴随更多的跨方言/语言差异。

(23) 表示存在量化的数词是中心语,位于 Num^o;表示具体数值的数词是最大投射,位于 SpecNumP。

首先看西南官话的“一”。它不仅和“两^{概数}”“几”一致,无法用于回答确切数目(如(24a)),实际上它根本不能承载重音,如(25)所示:

(24) a. 问: 你买哒好多_{多少}本书?
答: i. #我买哒两^{概数、轻读}/几本。

[®] 需要指出这些所谓的“简省”并不一定发生在音韵层面,它可能仅包含一个语义解读为单数的[-PL]特征或空数词,正如在北部吴语定指“量名”短语中的情况。学界对普通话的不定指“量名”短语的分析则还远未达成共识,另参见本文结语部分。

ii. 我买哒两^{确数、重读}/三/四/五本。

(25) *一^{重读}本书

具有歧义的“两”在回答具体数目时只能重读，获得确数解读。因此它具有中心语/指定语的双重身份。可是西南官话“一”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二节已经提到，如果在语境中其数量恰好是一，那么回答者就需要将重音放在量词上。如(11)，重复为这里的(24b)，所示。(24c)是普通话的对照，后者可以自由地将“一”重读来表示具体数值：

(24) b. 问：你买哒好多本书？

答：我（只）买哒（一^{轻读}）本^{重读}。 “我（只）买了一本”

c. 问：你买了多少本书？

答：我只买了一^{重读}本。

不妨把(24b)的现象称作量词的数量用法。因为此处的“一”完全不能重读，且可自由省略，所以我们认为具体数值为一的语义并非由它实现。又如(26)是在市场中经常能听到的叫卖用语，此时“一^{轻读}”几乎总是不出现。也就是说，在西南官话中，重音在量词上的“量名”短语做数量解读，恰好对应于普通话中重音在“一”上的“一量名”短语：

(26) a. 块^{重读}钱斤^{重读}。 “一块钱一斤”

b. 块^{重读}钱两^{重读}斤。 “一块钱两斤”

另一个论据来自于“打”构式。张一舟等(2001: 168—173)观察到成都方言使用“打[ta⁵³]”的相关构式来表示主观大量^⑩。如(27)所示，“数打数”形式表示说话人认为该数值在主观上是相当多的。当基数词是复杂形式时，“打”左侧仅重复该形式的第一个音节：

(27) a. 我手头有三打三本稿子，今天打不完。（=“整整三本稿子”）

b. 他私人藏书五打五万本。（=“整整五万本”）

不妨把“打”构式看作是作用在 SpecNumP 位置的一种形态手段：

(28) [NumP 五-打-五万 [Num' [ClP 本]]]

具体的句法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对于我们重要的是，当这种主观大量恰好是“一”时，“一”本身严格地不能参与到“打”构式中：

(29) *我喝了一打一杯水。 intended: “我喝了整整一杯水”

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数值为“一”的主观大量无法使用“打”构式来表达。如(30)所示，当具体数值为“一”时，同样的程式需要由量词来进行：

(30) a. 他喝了(%一)瓶打瓶，还不醉。

b. (%一)桌打桌子菜，四个人吃不完。

^⑩ “打”是记音字，本字不明。我们猜测它可能来自“大”，但是没有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数词“一”仍然可以出现在“打”构式的最左侧，尽管更常见的情况是不说“一”^②。该处的“一”位于 NumP 之上，只能被分析为位于 D° 的中心语。基于这些讨论，我们作出如下归纳^③：

(31) 在西南官话中，“一”总是中心语。

“一”既可能合并于 Num°，又可能合并于更高的中心语位置；其中包含一个移位的过程，尽管这不一定发生在共时层面。

现在看北部吴语的情况，第三节提到在富阳方言中，“一”与其他表示具体数值的数词一致，无法受指示词“葛”修饰，与中心语“两^{高降调}”的表现截然不同。我们据此提出(32)的假设（它实际上就是前文(21)的一个部分）。这里的“北部吴语”没有包含十九世纪上海/宁波方言的情况：

(32) 在北部吴语中，“一”总是位于指定语位置的最大投射。

绍兴柯桥方言也为(32)的正确性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盛益民(2015)分析了柯桥方言中的“(一)量名”短语。一方面，当“(一)量名”短语做数量解读时，“一”无法省略：

- (33) a. 要得*(一)本书，弗是两本。 “要了一本书，不是两本”
b. 问：上外去得几个人？ “昨天去了几个人？”
 答：去得*(一)个人。 “去了一个人。”

此时的“一”位于 SpecNumP 位置。另一方面，当“(一)量名”短语在宾语位置做不定指解读时，“一”反而绝对无法出现^④：

- (34) a. 渠背得(*一)只书包弗晓得望何里去哉。
 “他背着(一)个书包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b. 我前两日去得(*一)埭北京。
 “我前几天去了(一)趟北京。”

(33—34)在合法性上的对比说明柯桥方言中仅有具体数值解读的“一”存在。从(34)可以看到，普通话及西南官话中出现在中心语位置的“一”在柯桥方言中的对应成分某种零形式，可以将它看作是空数词，且只能获得单数解读。

5. 结语与余论

本文的主要论据来自西南官话和北部吴语。在普通话中，相关的证据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但因为(5)对数词的中心语/指定语二分法是基于语义确立的，那么只要这种语义上的区分成立，我们对数词句法位置的分析就同样可以适用于普通话。当“一”“两”轻读而不强调具体数量时，它们位于中心语位

^②根据调查，实际上在(30)中，相当一部分的西南官话使用者（包括笔者）完全不接受“一”出现的情况。

^③本文讨论的“一”不包含它作为语素出现在数词复杂形式中的情况，例如在“三万零一”中，“一”当然不是中心语。

^④盛益民(2015)同时提到在主语位置似乎偶有不定指的“(一)量名”短语出现：

(i) (一)件衣裳被风吹得去哉。 “一件衣服被风吹走了。”

需要指出这并不对我们的论证构成反例。柯桥方言与普通话类似，不定指成分很难出现在主语位置。盛益民(2015)指出这些情况主要是在报道新信息的“新闻报道句”中。此时位于主语位置的“(一)量名”短语显然需要其他条件来允准，若按照蔡维天(2002, 2009)的处理方式，就可以认为在(i)中“(一)件衣裳”受惠于“存有完封(existential closure)”，其左侧包含一个表示存在量化的空算子使得整个名词性结构获得指称解读。

置；当重读而表达具体数值时，它们就与更大的数词类似，作为最大投射出现在指定语位置^⑥。表示单数的成分常体现为显性的中心语“一”，也可能以空数词的形式出现，两者句法分布不同，但语义解读接近。

至此，我们就可以对本文的讨论作出如下总结：

(35) a. 在西南官话中，数词“一”仅能够表示单数的存在量化，位于中心语位置；具体数值的“一”由其他方式实现，比如量词的数量用法。数词“两”在表示复数的存在量化时位于中心语位置，语义上相当于“几”；当它表示具体数值的“二”时，就与“三”及以上的数词一致，位于指定语位置。

b. 在北部吴语中，数词“一”仅能够表示具体数值，位于指定语位置；北部吴语以零形式表示单数，这种零形式必须依靠某些句法手段（如量词移位）允准。数词“两”在表示复数的存在量化时位于中心语位置；当它表示具体数值的“二”时，就与其他数词一样，位于指定语位置。两个“两”可以通过语音形式来区分。

c. 在普通话中，数词总是可以出现于指定语位置来表示具体数值；“一”“两”还可充当存在量化词，合并于中心语位置（另参见蔡维天（2002），Zhang（2013：93—106）对这些用法的讨论）。

d. 不定数词“几”总是处在中心语位置。

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如下：

(36)

方言	中心语/存在量化		指定语/具体数值		
	[-PL]	[+PL]	“一”	“两”	其它
西南官话	一	两 ^{轻读} 、几	句法手段	两 ^{重读}	三、四、五……
北部吴语	零形式	两 ^{高降调} 、几	一	两 ^{曲折调}	
普通话	一 ^{轻读}	两 ^{轻读} 、几	一 ^{重读}	两 ^{重读}	

这一格局还对普通话宾语位置上的不定指“量名”短语的分析有所启示。一方面，吕叔湘（1944）、Chao（1968）、Jiang（2012：193—205）等认为它来源于“一”在音韵上的简省，不定指的“量名”短语就是“一量名”短语；Cheng & Sybesma（1999）、Her等（2015）则认为不定指“量名”短语包含一个语义解读为单数的空数词，原则上和“一量名”短语不能等同。本文的讨论则显示，北部吴语的不定指“量名”短语必然包含一个空数词，而西南官话的类似结构则更可能来自“一”在音韵上的

^⑥在普通话中，“一^{阳平}”“俩”“仨”分别被认为是“一个”“两个”“三个”的合音形式（赵元任1927，刘祥柏2004等），这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认为是由小数词的中心语移位造成的（参见注释6对孟加拉语类似情况的说明），从而佐证我们的观点（还需要把“三”分析为表示三数的中心语，这可能是不太理想的处理）。但是很遗憾，这个办法无法派上用场。一方面，赵元任（1927）指出实际上北京口语中其他数词也能够造成类似的音变现象（“四个”>“四呃”；“八个”>“八阿”）；另一方面，这些形式同样可以取得数量解读。除此之外，在中原官话商州方言中，所有小于“十”的数词和“几”与量词搭配都能有系统的变韵形式（张成材2007），这显然是单纯的音韵现象，与我们的中心语/指定语分析无关。

有条件简省（另见陈秋实（2022））。既然普通话的“一”是两者的并集，那么两者都并非不可能。同时，这里很可能存在一些人际区别，因为众所周知，不同的普通话使用者的方言背景是不一样的。另参见 A. Li & Wei（2019）对不定指“量名”短语的跨方言分析。

本文的结论都可以基于（5）和具体语言事实的结合而推导出来。除此之外，我们相信这种基于语义的二分法不仅在汉语中成立，它在其他语言中的成立也是大有可能的。确切地说，本文讨论了具体数值与数特征的区别。一个语言很可能没有发达的表示具体数值的方式（Comrie 2013），但即使是在 Pirahã 语这样基本不存在数词的语言中也可以观察到单/复数的某种对立（实际体现为少/多；参见 Frank 等（2008））。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讨论在理念上还契合于制图理论中一个特定的功能中心语总是由所有语言所共享的假设（Cinque & Rizzi 2010）。

参考文献

- 白 鸽 2013 《类指现象的跨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 蔡维天 2002 《一、二、三》，《语言学论丛》第 26 辑，301—312 页。商务印书馆。
- 蔡维天 2009 《汉语无定名词组的分布及其在语言类型学上的定位问题》，《语言学论丛》第 39 辑，302—327 页。商务印书馆。
- 陈秋实 2020 《“数量名”语言中的定指“名（数）量”短语：石柱方言名词性结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陈秋实 2021 《重庆石柱方言的定指表达手段》，载盛益民主编《汉语方言定指范畴研究》，44—55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 陈秋实 2022 《比较视野下的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当代语言学》第 2 期，231—251 页。
- 陈 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 2 期，81—92 页。
- 邓思颖 2010 《形式汉语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贺川生 2016 《论汉语数量组合的成分完整性》，《当代语言学》第 1 期，1—18 页。
- 李旭平 2018a 《吴语名词性短语的指称特点——以富阳话为例》，《中国语文》第 1 期，37—48 页。
- 李旭平 2018b 《吴语指示词的内部结构》，《当代语言学》第 4 期，478—496 页。
- 林素娥 2018 《早期上海话中表定指的“一+量名”结构》，第四届方言语法博论会议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 刘祥柏 2004 《北京话“一+名”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 1 期，36—39 页。
- 吕叔湘 1944 《“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金陵、齐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第四卷。
- 覃东生 2007 《宾阳话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盛益民 2015 《吴语绍兴柯桥话“一量（名）”短语研究》，载刘丹青、李蓝、郑剑平主编《方言语法论丛（第 6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盛益民 2017 《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差异与共性表现》，《当代语言学》第 2 期，181—206 页。
- 盛益民 2019 《吴语绍兴方言“两”的数量用法和指称用法》，《中国语文通讯》第 2 期，1—21 页。
- 盛益民 李旭平 2018 《富阳方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 石汝杰 刘丹青 1985 《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第 1 期，160—166 页。
- 徐海英 2011 《重庆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 3 期，39—40 页。
- 许秋莲 2007 《衡东新塘方言量名结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王洪钟 2008 《海门话概数词“多[ta¹]”的定指用法》，《中国语文》第 2 期，150—153 页。
- 张成材 2007 《商州方言口语中的数量连音变化》，《中国语文》第 2 期，159 页。
- 张一舟 张清源 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
- 赵元任 1927 《俩、仨、四呃、八阿》，《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12 号。
- Abney, Steven P.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ertation, MIT.

- Bošković, Željko. 2008. What will you have, DP or NP? In Emily Elfner & Martin Walkow (eds.),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37: 101–114. BookSurge.
- Bošković, Željko. 2009. More on the no-DP analysis of article-less languages. *Studia Linguistica* 63(2): 187–203.
- Bošković, Željko. 2014. Now I'm a phase, now I'm not a phase: On the variability of phases with extraction and ellipsis. *Linguistic Inquiry* 45(1): 27–89.
- Chacón, Dustin. 2011. Head movement in the Bangla DP. *Journal of South Asian Linguistics* 4(1): 3–25.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H.-T. Johnny. 2011. On the DP/NP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7.1: 8.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oderick A. Jacobs & Peter S.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Ginn & Company.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 Luigi Rizzi. 2010.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Bernd Heine & Heiko Narrog (eds.),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51–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2013. Numeral bases. In Matthew S.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chapter/131>.
- Dayal, Veneeta. 2012. Bangla classifiers: Mediating between kinds and objects. *Rivista di Linguistica* 24(2): 195–226.
- Frank, Michael C., Daniel L. Everett, Evelina Fedorenko & Edward Gibson. 2008.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108(3): 819–824.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MIT Press.
- Her, One-Soon, Ching-Perng Chen & Hui-Chin Tsai. 2015. Justifying silent elements in syntax: The case of a silent numeral, a silent classifier, and two silent 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93–226.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Li. 2012. Nominal argumen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Kayne, Richard S. 2019. Some thoughts on *one* and *two* and other numerals. In Ludovico Franco & Paolo Lorusso (eds.), *Linguistic Variation: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335–356. Walter de Gruyter.
- Li, Xuping.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Walter de Gruyter.
- Li, Y.-H. Audrey.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693–702.
- Li, Y.-H.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75–99.
- Li, Y.-H. Audrey & W. Haley Wei. 2019. Microparameters and language variation.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4(1): 106.1–34.
- Lin, Yi-An. 2009. The Sinitic nominal phrase structure: A Minimalist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 Rizzi, Luigi.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223–2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Andrew. 2005. Classifiers and DP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In Guglielmo Cinque & Richard S.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806–8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Andrew & Saurov Syed. 2016. Blocking effects of higher numerals in Bangla: A phase-based analysis. *Linguistic Inquiry* 47(4): 754–763.

- Syed, Saurov & Andrew Simpson. 2017. On the DP/NP status of nominal projections in Bangla: Consequences for the theory of phases.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2(1): 68.1–24.
- Tang, C.-C.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theory.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Wu, Yicheng & Adams Bodomo. 2009. Classifiers ≠ determiners. *Linguistic Inquiry* 40(3): 487–503.
- Zhang, Niina N.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Walter de Gruyter.

Head or Specifier? On the Position of Numerals in Chinese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numeral and other elements (demonstrative, classifier, noun, etc.) in the nominal domain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numeral itself in Chinese are relatively few. Based on cross-dialectal evidenc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so-called “numeral” in Chinese is not a homogenous category. Numerals might be merged either in head or specifier positions. I demonstrate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an arbitrary one; it has a steady semantic basis. On the one hand, head-numerals by definition can undergo head-movement (as existential operato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Spec-numerals express specified number, and might block some DP-internal A'-movements.

Keywords: numerals; nominal phrases; the [NP-Num-CI] phrase; the [CI-NP] phrase; Southwestern Mandarin; Wu Chinese